

“低处”的活法与西北乡村新图景

——论《亲爱的人们》中马金莲对故乡的再造

刘志珍

内容提要：《亲爱的人们》通过讲述马一山父子两代人的生活史与奋斗史，将奔奔车、电视机、手机等现代物置于历史链条，钩沉物的时代意义。马金莲以对故乡深情凝望的姿态，肯定了现代商业文明之于乡村的积极作用，同时赓续中国抒情传统，叙写出改革开放以来西北乡村振兴的新图景。小说通过书写马舍娃等新生代农民主动利用各种现代工具并回乡创业，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叙事模式，再现了乡村作为主体的现代化过程。借由“主体性”的乡村振兴，《亲爱的人们》为当代乡土小说提供了一种“在地的现代化”叙事方案，这对我们今天如何重新发现乡村，又何以安放传统，探察乡村过去的过去性、过去的现存性，发掘乡村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可能路径，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亲爱的人们》 现代物 抒情传统 新生代农民 主体生成

对于马金莲来说，西海固是重要的文学地标，那里既是她生命的来处，亦是她搭筑梦想、建构自我文学园地的源泉。在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马金莲孜孜不倦地“深描”脚下的土地，以对故乡的想象性重构，书写西北乡村绵密的日常生活图景，西北独特的地方文化景观、人情伦理、历史画卷等都随之铺展开来。马金莲曾坦言：“之所以反复不停地书写这样一个村庄，是因为那是生命出发的地方。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也是从那里出发的……村庄像胎记一样深深镌刻在我的生命底座上。所以，喜欢围绕着村庄来讲述，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结和心底的秘密。”^①故乡的人与事、精神文化地理、情感结构、思维惯习等都浸润着马金莲的心灵，形构了她看待自我与他人、世界的方式，也塑造了其文学叙事方式及美学风格。她对西北乡村经验、民间故事的叙述，又与对回族文化心理的再发现相嵌合，地方性进而成为解读马金莲文学世界的重

^① 汤天勇：《马金莲：用敬畏演绎生命的珍贵与苦难的坚硬》，《芳草》2018年第4期。

要路径。

马金莲早期的创作,如《碎媳妇》《赛麦的院子》《风痕》等,都与当下现实拉开一定距离,“以天然的悲悯情怀,关注着西海固大地上那些总是以柔弱顺从的姿态去抗拒强大的命运、无形的旧观念、严酷的自然环境的女性”^①。改革开放促使“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②,这一历史性巨变自然给当代乡土小说带来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显著的表现是“以流寓者(主要是从乡村流向城市的‘打工者’,也包括乡村之间和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流寓者)的流寓生活为题材,书写工业文明进击下的传统文明逐渐淡出历史走向边缘的过程”^③,这成为当代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叙事维度。近年来,在《孤独树》《四儿妹子》《平安夜的苹果》等小说中,马金莲聚焦西北乡村伦理秩序、人地关联等的现代裂变,以及乡村青年的城市“流寓”困境,体现出对乡村流动性变革的现代反思,从中可以看到马金莲告别对“静态乡村”的“滞后性”回望,直面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的创作转向。

新作《亲爱的人们》可以说是马金莲的自我整合之作。小说通过讲述马一山父子两代人的生活史、奋斗史,围绕修路、建水坝、拉电、栽信号塔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奔奔车、电视机、手机等现代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描绘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北乡村振兴的壮丽图景。与当代乡土小说常见的“挽歌”式叙事不同,《亲爱的人们》通过书写乡民们对现代文明的热情渴求与接纳,马舍娃、祖祖为代表的“流寓者”的生命遭际,超越了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叙事模式,在描摹城与乡双向流动、融合的现代新景观的同时,再现了乡村作为主体的现代化过程。乡村不再是现代化的受动者与被损害者,而是积极接受现代新事物、努力寻求生机的主动者,借由主体性的乡村振兴,马金莲为当代乡土小说提供了一种“在地的现代化”叙事方案。

一 奔奔车、电视机、手机等物对乡村的现代重塑

马金莲善于将人与特定的物相连接,使人“心中的所爱和所恨都有‘物’的依托和基石”^④。春江水暖鸭先知,“物在人际间的流通,常常是一种以物为话语符号而进行的言说”^⑤,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符号,物的流转、更迭总是携带着时代的密码,能够更为直观地呈现整个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精神气象。马金莲早期的小说如《1987年的浆水与酸菜》《永远的农事》《窑年旧事》等,以浆水、酸菜、土豆、胡麻、窑洞等传统的“物景观”连接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西海固乡民的生命形态及其困厄中的心之所善、西北独特的地域文化风俗、回族内化于日常的民族文化随之凸

① 马金莲、火会亮:《以朴素的方式抵达灵魂的彼岸——就小说创作对话马金莲》,《朔方》2015年第1期。

② 贺雪峰:《序: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贺雪峰主编《回乡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页。

③ 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④ 季亚娅:《生活史与纪念物——马金莲的微观诗学》,载马金莲《化骨绵掌》,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286页。

⑤ 傅修延:《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显。伴随马金莲从对传统“静态乡村”的诗性钩沉到探察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写作转向,她的小说关注“乡村作为主体如何被城市化碰撞、激活、创造和再生”^①,以各种现代之物透视乡土中国的重塑,展现出作家主体间性、美学趣味的时代新变。

《亲爱的人们》开篇以牛、李两家因一桶水引发的家族大战,以及马一山雇葫芦镇川区何小平的奔奔车去县城卖土豆,因路况不好而翻车的事件,勾勒出扼制羊圈门人命脉的水和路两大历史悬疑,折射出 20 世纪 80 年代西北乡村偏狭、落后的生存现状。山脉绵延、水资源极度匮乏的黄土高原,形塑了西北乡村闭塞古老的民族风情和西北乡民顺天应命、安贫乐道的生命形态。艰苦的生活环境极大地阻碍了西北乡村的发展,使其成为被遗忘的他者。小说中,马一山雇何小平的奔奔车,想跟川区及交通较为便利地区的村民一样,将辛苦一年种植的土豆直接拉到县城粉丝厂,以免遭二道贩子的价格宰割,这可看作马一山不愿再像祖辈那样被动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而是尝试破旧立新。计划的破产给马一山带来巨大打击,他用架子车将土豆拉到葫芦镇贱卖,并萌生了买奔奔车的想法。不过买奔奔车这一具有重要意味的事件,却是由前队长李有功的儿子嘎西实现的,这让马一山在感叹李有功家底殷实的间隙,重思嘎西“从小队长的儿子,变成了最窝囊的边缘人,从高处的风光跌落到最不起眼的尘土里”^②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创痛,及其重振家族的可能。

奔奔车作为一个消费意象,在《亲爱的人们》中具有时代标识的意义。它在川区及附近村庄的流行,给羊圈门注入了新的时代风尚和现代元素。嘎西买奔奔车则标志着羊圈门流动性变革的真正开始,它将羊圈门人从繁重的人力、畜力劳动中解救出来,使乡民们赶集变得频繁。这加速了羊圈门与外界的流动互融,对改善其闭塞、落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提高经济、生活水平大有裨益。奔奔车也早已超越物的使用价值,成为家庭财富的象征。买奔奔车“已经不是简单的一辆农用车的问题,而是关乎你在羊圈门的声望、威信等重大问题了”^③。让·鲍德里亚强调现代人在物的包围下,“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这样一种境地”^④,消费的目的不再是物本身,而是附着其上的象征性意义。早在《1986 年的自行车》中,马金莲便叙写了自行车这一话语符号潜在的象征价值。不论是它将当民办教师的父亲与其他乡民区分开来,还是跛脚的舒尔布相亲时借父亲的自行车去撑面子,物都超越使用价值,成为人物主体认同的重要来源。《亲爱的人们》中,奔奔车揭示出乡村与城镇的阶层差异,它强化了何小平作为川区人的身份优越感,促使他揭开队长李有功只顾自家利益、造成村里修路困局的疮疤。嘎西的奔奔车则昭示出社会权力结构的分化与再生,消费的逻辑促使物品法则让位于符号法则,消费客体“被结构化成一种代码

① 申霞艳、杨穗婷:《乡村·童年·岁月——马金莲论》,《文艺评论》2017 年第 12 期。

② 马金莲:《亲爱的人们》(上),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 年,第 184 页。

③ 同上书,第 187 页。

④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5 页。

而获得了权力”^①。在马一山带头雇嘎西的奔奔车拉麦子、碾场后,对与李家有严重家族矛盾的牛家来说,是否雇用其奔奔车关涉整个家族的面面与立场。牛三炮哥俩不顾村人非议,以原始劳力对抗附着于嘎西奔奔车上的强权,维护了家族声誉。

与奔奔车对乡村劳作方式、身份认同的现代重塑相呼应,电视机的出现在进一步强化物的符号价值的同时,也拓展了乡民的精神视野和文化活力。通电的消息让整个羊圈门人欢呼雀跃,伴随一根根电线杆的拔地而起,一种迥异于古老生活的气息悄然滋生,“人们感觉,这些杆子将要连通的不仅仅是一种叫电的东西,还有别的更多更重要的,是一个小山村与外头大世界之间被连接的期待,更是一种不愿意被外界遗忘的渴望”^②。符号系统宰制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羊圈门人来说,那一根根木头电线杆既是联结自我与世界的桥梁,凸显出“沉默的村庄”不愿被外界遗忘的内在渴求,亦是乡村权力的象征,让人们为此明争暗斗。小说在表达羊圈门人通电时的集体性精神震颤外,又以盲人三三对电的感知、欣喜和眷恋,传达出科技革命对乡村的重建,对个体精神隐流的激活与敞亮。耀眼的电灯打开了三三尘封已久的心灵世界,使其长期被忽视乃至自我封匿的欲望,尤其是对光明的眷念被照亮和看见。而三三率先购买电视机的行为,为村民带来了一场集体性狂欢,其派生价值又使三三给媳妇长了脸,让她得以挺直腰杆,风光了一回。深夜人群散去后,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幸福感溢满胸膛,“他感受到了主人翁的滋味,那是被大家伙儿敬重、羡慕、礼让的味道……他活了这些年,平时被人轻贱惯了,哪会有人愿意这样尊抬他,不要说全羊圈门的老少,就是一些娃娃,也看不上他,不会轻易登他家的门”^③。与三三对光亮朴素挚诚的向往以及电视机带来的精神慰藉相映衬,腿脚不便的跛六十迫切希望羊圈门人买一辆农用车,载他走出村庄,去外面转转。盲人与灯光、电视,跛子与远方,这些对照形成的内在张力显示出作家独特的生命观及对乡村的温情观照。有着身心障碍的边缘化小人物,是马金莲小说人物画廊里一个引人注目的存在,如小刀(《蝴蝶瓦片》)、克里木(《瓦罐里的星斗》)、程丰年妻子(《掌灯猴》)等。“如果说身体残缺的人更接近真主(西海固一带回民的说法)的话,那么,作者则努力使我们更接近一个‘人’可能达到的完满境界,更接近一种常人难以发现的超验之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美寄蕴了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和灵魂的关切。”^④回族文化深刻影响了马金莲的生命观。《亲爱的人们》中,马金莲在着力叙写马一山、马舍娃、祖祖、碎女两代人生命遭际之外,还塑造了麻眼三三、跛六十等身体残疾的边缘人,展现出他们作为“人”最本真的精神渴求,透视出作家对生命的尊重和灵魂的关切。

各种现代之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重构着个体的身份认同,也带来人

①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

② 马金莲:《亲爱的人们》(上),第141页。

③ 同上书,第165页。

④ 江飞:《日常生活、伦理底色及底层叙事的可能——马金莲的文字世界》,《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21期。

们时尚观念、消费记忆等的时代新变。齐奥尔格·西美尔认为“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进行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①。穿衣打扮是人们彰显自我,寻求社会确证的直接方式,衣着既有保暖与审美效用,又具有区分个体社会阶层、身份地位、家境财富等象征意义。羽绒服、打底裤、高筒靴等城市女性的时髦穿搭,与乡村的大裆裤、宽棉袄、布鞋形成鲜明对照,即使“有个别年轻媳妇穿着半裙,却不敢像城里人一样光腿穿,裙子下面又是黑色裤子,这就看上去臃肿又好笑,没什么美感可言”^②。受科技、经济水平、交通等的制约,某种器物、潮流从繁华都市进入偏远乡村,需经历漫长的流动过程。《亲爱的人们》以大学生祖祖的目光,审视了兜兜转转进入羊圈门的流行和时尚,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文明杂糅共生的乡村奇异性美学。

消费的关系网络形成紧密的欲望魅惑链,其总体性和同一性强制“让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③。人们在消费的同时生产着消费。在《亲爱的人们》中,奔奔车的从无到有展现出时尚同化作用的强大效能,与现代农用工具为乡村赋形相呼应,摩托车、小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更迭置换,既体现出乡村的现代变革,又烘托出消费暗示链的欲望逻辑。现代性的浸染并非简单的工具变革,还改变着乡村的耕作方式与社会文化结构,乃至乡民们的思想观念与精神信仰。相较于奔奔车、摩托车、汽车等实体工具,微信、快手等网络社交媒介让人们脱离既定的地域边界,重建与他人、世界的联系,极大地标示并强化着时代的加速度。这些现代消费物及其符号价值,在对人进行认知重组、价值赋值的过程中,生产和制造着新的符号认同。人们在使用物的同时,也受到物的反作用力,潜在地为物所宰制和掠夺。《亲爱的人们》通过羊圈门人争相购买奔奔车、手机等时尚跟风热潮,折射出人们潜在的盲从心理与攀比性的虚荣消费;又通过马百里、马一山父子对电视/手机带坏乡村风气,尤其影响夫妻关系、家庭和谐稳定的担忧,以及三三儿子贝壳沉迷电视剧的忘我境地、对影视亲密镜头的漠然等,展现了电子媒介对传统乡村伦理的浸染和损害,昭示出作家对网络时代乡村家庭教育的深切忧虑。

小说通过各种细节凸显电视、手机等对现代人时间的占有与销蚀,对人的精神的操控与损伤,并集中体现了网络虚拟空间的魅惑性、驳杂性。马舍娃安装手机微信后,懵懵懂懂中打开漂流瓶,与“有缘人”网恋,却惨遭网络诈骗。碎女想通过直播赚钱给女儿小十七治疗癫痫,但在驳杂的网络世界里,她不仅承受着网友的恶意攻击和谩骂,还因直播耽误了家务,搞得家中鸡飞狗跳。婆婆觉得直播很不光彩,丢了李家的脸面;母亲也不愿女儿直播已变得呆傻的马一山,不

① 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年,第96页。

② 马金莲:《亲爱的人们》(上),第436页。

③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第116页。

想一生好强的丈夫成为被看、被消费的对象。微信、快手等网络社交媒介极大地扩展了人的社交半径,搭建起一个全新的世界,但网络的虚拟性也暗藏危机,人性的斑驳暗影借此展露无遗。小说以舍娃的网络诈骗遭际、碎女的直播遭遇展现出网络生态的乱象与人性的复杂幽微,也以碎女婆婆、母亲对直播复杂的抗拒心态,展现出传统乡村在接受新生事物过程中的精神阵痛。由此,《亲爱的人们》以物时代的日常生活情景,投射出现代文明对传统乡村文明的影响与改变。

二 抒情传统与乡村文化的裂变

《亲爱的人们》中,奔奔车、电视机、手机等现代物,给乡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巨大改变。“马金莲既认同现代乡村的物质富足,又缅怀过去的孕育于传统乡村的精神价值”^①,在对消费时代物的礼赞和对乡村新景观、新形态的诗性建构中钩沉乡村新面貌的同时,马金莲也深切关注现代商业文明冲击下传统乡村的文化与精神震荡,通过对故乡的深情回望和意义再造,缅怀传统乡村的精神价值,发掘乡村文化传统的现存性、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可能路径,体现出鲜明的抒情风格。

抒情性是马金莲小说一以贯之的美学特质。许多学者指出马金莲与萧红小说的某些相似性,江飞认为马金莲“自觉或不自觉地接续了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汪曾祺这一脉的叙事传统,有意模糊小说和散文的文体界限,或者说跨文体的内在融合使其小说呈现出某些‘散文化’的审美特征”^②。汪曾祺指出“散文化小说是抒情诗”,其作者也“大都是抒情诗人”^③。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鲁迅,“五四之后,抒情传统并没有断裂,抒情特征主要在废名、沈从文、萧红、汪曾祺等作家的散文化小说里得到赅续和扩展。”^④20世纪60年代,陈世骧率先提出抒情传统这一美学概念,并得到高友工及其影响下形成的台湾“抒情传统学派”的响应,拓宽了古典文学的研究视域。“王德威近年则把有关抒情传统的讨论延伸至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以启蒙、革命等话语作为参照系来理解抒情传统的现代传承。但他们对抒情传统的辨正大多停留在国族政治领域,忽略了经济或商业意识形态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更没有注意到新一代作家对抒情传统的呼应和再造所作出的探索。”^⑤从对“乡土中国”人情、人性之美的诗意表达,到对乡村现代化的文化观照,马金莲始终以对故乡的深情凝望,呼应和再造着抒情传统。

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指出:“中国传统处境的特性之一是‘匮乏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正和工业处境的‘丰裕经济’(economy of abundance)相对照……在匮乏经济中主要的态度是‘知

① 许峰:《新时代以来“西海固文学”的传承与创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2期。

② 江飞:《日常生活、伦理底色及底层叙事的可能——马金莲的文字世界》,《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21期。

③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邓九平编《汪曾祺全集 四 散文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④ 刘艳:《抒情传统与“汪氏文体”特征——论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长江学术》2019年第1期。

⑤ 谢有顺:《“70后”写作与抒情传统的再造》,《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足’，知足是欲望的自限。在丰裕经济中所维持的精神是‘无餍求得’。”^①马金莲早先对传统“静态乡村”的“滞后性”书写，昭示出古老中国匮乏的经济本质和中国人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生命哲学，“在将饥荒日常化、主体化的同时，马金莲关注的是人的应对方式及在其中的情感体验，展现饥荒之际的人情与人性”^②。《父亲的雪》《柳叶哨》《1985 年的干粮》《长河》等都“从回民的日常伦理出发……用宁静、深情的笔触缓缓流淌出一个淳朴、善良的新世纪乡土世界”^③。在《安守宁静的美好(代序)》中，马金莲坦言：“在清真寺拱北等地的回族传统节日上或者回族葬礼上，我让自己像一粒沙子一样，默默地镶嵌在最低处的地皮里，然后用自己的心跳感受这个群体的心跳，用自己的体温体味大众的体温。”^④马金莲以独特的抒情笔调和对日常生活的诗性建构，凸显了西北乡村朴素的生命哲学，以及回民坚韧、质朴的文化质地，呈现出对沈从文、萧红等人抒情传统的赓续与承接。

在感受本民族“心跳”和“体温”的过程中，马金莲看到了现代商业文明对乡村社会文化结构、道德伦理、精神信仰等的冲击和浸染。《舍舍》中，遵从回族传统、坚持佩戴头巾的舍舍，进城后摘下帽子、盖头，把头发烫成卷，波浪一样披着。《金花大姐》中，受人敬仰的阿訇穆萨，迫于生计从事最为低贱的工作。《我的姑姑纳兰花》以“我”的儿童视角，再现了姑姑身穿白色婚纱，打破婚嫁不穿白的传统习俗，开乡村风气之先的盛大场景。《亲爱的人们》同样借由祖祖拍婚纱照、穿婚纱、去市里买衣服和化妆品、请化妆师化妆等，展现出乡村风土习俗、宗教仪轨等的时代新变。怀有浓郁乡情、懂事乖顺的马舍娃，也抛开传统的宗教戒律，当着姐姐的面喝酒。物是个体人格的延伸，马金莲既讴歌奔奔车、手机等现代物为农村带来的希望与新生，也通过物对人的反作用，透视出现代文明对乡村传统文明的侵袭和改造。其小说常常以回族传统节日，尤其是婚丧嫁娶的时代嬗变，展开对现代化浪潮中回民精神离散的文化质询。而她对信仰问题的文化反思，恰巧“与上世纪 90 年代知识分子大呼人文精神失落相呼应。消费社会的精神建构如何可能？人心如何妥善地安放？马金莲的追问由此抵达了时代的核心”^⑤。小说还通过马德福老人身份威望的锐减，凸显乡村社会风气、伦理道德、权力结构的剧变。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马德福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凭一己之力平息了牛、李两家的械斗，但面对改革开放后外出打工青年从发型到人际交往、伦理道德、娱乐方式等的巨大变化，这位乡村传统伦理的守卫者悲愤却回天乏术，尽显乡村“前喻文化”、教化性权力的没落。

在《亲爱的人们》写作的准备阶段，马金莲进行了扎实的实地采访，并重读了《山乡巨变》《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经典文本。她在延续现实主义写作手法，描摹西北乡村本然面貌的同

① 费孝通：《乡土重建》，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 年，第 3 页。

② 孟繁华、邵部：《乡土的余温——评马金莲的小说创作》，《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 年第 10 期。

③ 乔宏智：《苦难中的温暖与淳朴乡土的嬗变——论马金莲的小说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14 年第 6 期。

④ 马金莲：《安守宁静的美好(代序)》，《1987 年的浆水和酸菜》，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 年，第 6—7 页。

⑤ 申霞艳、杨穗婷：《乡村·童年·岁月——马金莲论》，《文艺评论》2017 年第 12 期。

时,以商业文明对乡村文化景观的现代重塑,人物精神的腾挪,勾勒乡村现代化的应然样态,展现出蕴涵温情与希望的乡村变迁史,勘探乡村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

托·斯·艾略特强调传统具有广泛深远的意义,蕴涵着一定的历史意识,“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①。《亲爱的人们》中,马金莲以对抒情传统的现代承续,擘画改革开放以来西北乡村振兴的壮阔画卷。村庄过去的过去性、过去的现存性皆显隐其间,消费时代的流动美学亦随之凸显。商业文明的进入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的衣食住行,不断更新着乡民们的审美追求和消费取向。小说通过对马一山女人的书写,呈现时代的加速度发展,女性从针线活中解脱出来,“铺的盖的穿的戴的,一律都能从集市上买到,简直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机器造不出来的”^②。对现代文明的过渡追捧,形构了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譬如乡民们争先恐后购买工业制品,甚至形成“好像只要是买的,就好得很,手工做的就土得拿不出手,只会丢人现眼”^③的盲从性消费心理。值得注意的是,“时尚只和变化有关,但像所有的现象一样,它有保存能量的倾向,它要以相对最经济的方式尽可能完全地达到目标。正是这个原因,时尚不断地回到旧的形式”^④,时尚、流行的周期性轮回,使曾遭厌嫌的手工制品重新受到市场青睐,并以对传统现存性的多维图解,体现出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正悄然逝去的乡村的眷恋。

段义孚指出:“恋地情结里有一项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恋旧。”^⑤恋旧是个体回溯历史、重新认识传统和自我的重要表征。对故乡的浓浓深情是马金莲文学书写的内驱力,这也促使她在对故乡的不断回望中,正视乡村现代化的诸种弊病,发掘乡村悠远绵长的历史以及乡村文化传统的现存性。《亲爱的人们》叙述了祖祖、马舍娃等城乡“流寓者”浓厚的乡土意识,也通过碎女的直播,再现了网友们潜在的“恋地情结”。面对混杂的网络环境,心灰意冷的碎女决定放弃直播,但无意中发布的父亲在崖口挖台窝的视频意外爆红。“大家纷纷赞扬马一山是乡村古老生活的守护者,尤其那些离开乡村的人,人在城里,心中还残留着对乡村的怀念,看到一个打扮朴素、默默下苦的农民,他们既激动又感动”^⑥,马一山“黄土大爷”的网络称号以及他和妻子朴实真挚的情感,烘托出城市浮游者的文化乡愁,使其以一种潜在的精神代偿抚慰现实创痛。“网络让大家虚情假意地爱上了乡村,将乡村已经和即将被遗忘的很多东西又翻出来见了天日”^⑦,这颇似斯

① 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② 马金莲:《亲爱的人们》(下),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第619页。

③ 同上。

④ 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第120—121页。

⑤ 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46页。

⑥ 马金莲:《亲爱的人们》(下),第1017页。

⑦ 同上书,第1016页。

维特兰娜·博伊姆所谓的“修复型的怀旧”^①。

“怀旧的涌现作为一种文化需求,它试图提供的不仅是在日渐多元、酷烈的现实面前的规避与想象的庇护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建构。”^②那些置身城市,却对乡村心怀着念的网友,以观看直播的方式,实现与乡村的“云对接”,其中自然包含观看者试图以此逃避残酷的现实境遇、寻求精神庇护的心理动因,但质朴、纯真的乡村文化景观,确实起到了涤荡城市“流寓者”焦灼迷惘的心灵、疗救隐秘的精神创痛以及重建自我的作用。与此同时,网络直播是一把双刃剑,城市网友对传统乡村的“云怀旧”,实则隐含着城市消费文化对乡村更为深层的情感盘剥,但同时也有利于激活、再造乡村传统文化,促使乡村在整合自我文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勘探乡村振兴的多元路径。碎女带女儿小十七卖力直播,却因找不到独特的“卖点”而不温不火,她心灰意冷中发布的父亲挖台窝的视频,却无意中暗合了广大城市“流寓者”的心灵沉疴和消费需求。碎女的成功象征古老的乡村本身就具备与城市现代文明对接的强大资本,对这一文化资本的合理开发,能够创造和生成新的文化活力,从而在助力乡村振兴中,促使乡村青年积极调动乡村“抒情传统”,成长为新时代乡村现代化建设接班人,从而实现自我主体的生成。

三 新生代农民的主体生成

改革开放改变了“乡土中国”的传统结构,宁静淳朴的村庄被迫置于流动的逻辑链条,整个社会进入现代工业处境的丰裕经济时代。“中国文学对于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的回应是相当丰富的,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碰撞、冲突,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精神生活的深刻变化,无数‘进城’农民的自我想象、身份转换等复杂的生存境遇,成为了这个时代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主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围绕着‘农民工进城’、‘农民进城’、‘乡下人进城’、‘城乡冲突’以及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格局变化等问题,展开了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③马金莲的写作延续了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以对丰裕经济时代“无饕求得”文化症候的揭示,探察乡村从静止到流动的结构变化,以及农民工进城后的存在之困。《孤独树》由留守儿童哲布孤寂的成长之殇,聚焦乡村“空心化”、土地流转等社会热点,重思乡村与城市、人与土地的复杂关系。新作《亲爱的人们》以乡村对奔奔车、手机等现代商业文明的积极接纳,以及传统资源的文化整合和开发,叙述了乡村作为主体的现代化过程;又以马一山与马舍娃、祖祖两代人的生命遭际,再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青年不同的人生面向,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历史画卷随之铺展开来。

在民办教师资格被人顶替后,马一山这一高加林式的中生代农民,在岁月的褶皱中膺服命

^① 修复型的怀旧强调返乡,尝试超历史地重建失去的家园。参见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导言:忌讳怀旧吗?》,《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7页。

^②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2页。

^③ 王建光:《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进城”故事——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城市想象及其表现》,海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1页。

运,建构起对乡村、土地深厚的情感认同。他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不顾村人的闲言碎语坚持供儿子、女儿读书。但面对家庭的经济困境,舍娃在高考来临之际选择南下打工,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成全了姐姐祖祖。他在城市的“流水线”努力赚钱供姐姐读大学,却不慎被骗入传销组织。从银川到西安,再到广州的寻子之路,可视为马一山知识分子精神信念崩塌,重建对自我、世界认知的过程。“这几年羊圈门好多打工的年轻人不断地外出和返回,他也曾听他们说起过,外头世界大得很,出去就撒在人海里了,他觉得那肯定是他们不识字,等于是睁着眼睛的瞎子嘛”^①,城市的急速发展将古老的乡村远远地抛在身后,极大地解构了“熟人伦理”与传统经验。在警察端掉传销窝点将舍娃遣送回家后,马一山虽深知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的痛苦,但仍希望儿子不要再外出打工。在他看来,舍娃错过了高考这一人生的关键节点,作为农民的后代,只能踏踏实实留守土地。但在乡村浑浑噩噩多年,始终没有找到出路的舍娃,还是选择重新回到城市。小说以他酒醉后与祖祖的对话,表达了农民工“故乡养活不了肉身,他乡安置不了灵魂”的尴尬境地。他们悬浮于城市表层,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创痛和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于是渴望回乡,怀念简单、质朴的传统乡村生活,却又清醒地看到乡村的衰落、破败,尤其乡村有生力量的流失以及农民对土地情感的疏离。

和舍娃的交谈给祖祖带来很大的心灵冲击,她一直为舍娃的前途忧心,却从未将他纳入农民工这一大的社会群体来思考。自此之后,祖祖的目光只要捕捉到农民工的身影,“就会忍不住多看几眼,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她熟悉的东西,那是一种感觉,一种城市还没有完全磨砺掉的属于乡村的泥土培养出来的底色……她禁不住把所有见到的农民工设想成羊圈门的乡亲,这样的念头让她只要看到他们就有一种亲切感”^②。她甚至设想如果没有考上公务员,自己也将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一员。但即使她考上了公务员,嫁到城里,实现了城乡进阶性迁徙,她依然游离于家庭与城市的外围,无法剔除骨子里的泥性和土感。祖祖与丈夫王全有和婆婆之间的情感隔阂,既源自她不遗余力地贴补娘家人引发他们的强烈不满,更根源于城市的傲慢与偏见,其间潜藏着深重的城乡阶层分化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祖祖和舍娃互为镜像。他们在彼此身上看见另一个自我,生发出理想与现实撕裂下的生命痛感。一方面,正是舍娃的无私奉献,祖祖才得以考上大学、公务员。但祖祖即使离开乡村,实现了城乡阶层蜕变,沉重的家庭羁绊,尤其是对舍娃牺牲前程主动让渡上大学机会的沉痛负疚感,使她无法真正斩断乡村文化“脐带”,始终面临城乡身份悬置的精神困境。另一方面,舍娃虽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却也无法否认内心深处对祖祖的羡慕乃至嫉妒的复杂心理。在舍娃的认知里,考上公务员便意味着拿到了终生幸福的通行证,而当送祖祖到乡政府报到后,他发觉现实与自己的想象相去甚远,这使他不再羡慕祖祖,有了直面自己的

^① 马金莲:《亲爱的人们》(上),第333页。

^② 马金莲:《亲爱的人们》(下),第910页。

勇气。祖祖婚姻的不幸,更是给了他警示,让他深刻体会到难以跨越的城乡阶层鸿沟,果断拒绝了电焊厂老板老孟招他做女婿,并送别墅作婚房、给他换台新车、婚后让他接管厂子等的巨大诱惑,选择与心爱之人回乡创业。

可以说,祖祖对故乡、亲人的爱与眷恋,实则是以舍娃为中介的。对舍娃的歉疚及对其人生出路的忧虑,不断激发着她隐秘的“恋地情结”,引发她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相较之下,舍娃对故土的情感更为自觉、深沉。小说以舍娃与摆兰香相亲时,对摆兰香家手擀面、绣花枕头、人力拉风匣等老手艺和老物件的书写,映射出舍娃心灵深处的乡情。现代女性摆兰香不仅谙熟传统的针线手艺,更凭一碗手擀面征服了舍娃的胃,民间手艺、民间味道与人物怀旧的文化乡愁相契合。传统的重新激活与再创造,重铸了人与人、人与乡的情感联结。马金莲在舍娃身上倾注了更多的精神愿景,通过书写他失学、进城打工、享受县里扶贫补助考取驾照,尤其参加全县农技培训后成长为新生代农民的人生蜕变,展现出政府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更注重农村新型人才培养的远见。

有文化与具备专业技能的新生代农民,是助力乡村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青年返乡创业提供了契机。当舍娃为在城市开电焊铺资金不足犯愁时,羊圈门一条连通东西两岸的大路使他豁然开朗,让他发现眼前即是店铺的最佳选址,领悟到自己一直渴望摆脱的并非羊圈门,并非熟悉的土地、村庄,“而是附着在这一切之上的东西,比如偏远、封闭、枯燥、艰难、贫寒、落后、匮乏、短见、愁苦、煎熬……”^①,由此重建对乡村的认同感、归属感。返乡创业的舍娃不仅顺利开了家电焊铺,还开了小吃店和小卖部,让摆兰香拥有了自己的人生主场;还在驻村扶贫组乔组长的多方劝解下接替李有劳,当了羊圈门的小队长,带领村民开发乡村旅游业,建立村史馆,呈现出生机勃勃的乡村新气象。网络的发达催生了新的购物方式,乡村快递驿站随之兴盛。性格跋扈、小孩子心性的碎女,也在网络这块炼金石的打磨下,对生活有了自己的理解和主见,不再是那个初中便与人私奔,17岁怀孕并早嫁的傻女子。小说结尾处,祖祖在舍娃的帮助下买了房,在县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以舍娃为代表的乡村不再是孱弱的帮扶对象,而具有了自我“造血”,甚至帮助他人、城市的能力。马金莲以舍娃、碎女等新生代农民的主体生成,指喻乡村振兴的主体性和内生力。但城市“流寓者”祖祖选择离婚并独自抚养女儿的人生抉择,映衬出马金莲对城乡融合中乡村进城青年命运的忧虑,进一步揭示出乡村城市化、现代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结 语

柳青《创业史》叙写计划经济时代,从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革命性转变。乔叶《宝水》

^① 马金莲:《亲爱的人们》(下),第1035页。

以地青萍的精神返乡,勾勒宝水村建村史馆、搞卫生运动、开餐馆和民宿等美丽乡村建设横截面。《亲爱的人们》则以对羊圈门过去与当下、新与旧的全景式描摹,再现了西北乡村改革开放以来的山乡巨变;通过马舍娃返乡创业,当选羊圈门小队长,带领村民建设旅游基地,推动乡村产业结构化升级,体现出新时代个人创业史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作家将各种现代之物置于历史链条,“伴随着‘物’的变化,借由对空白的想象我们可以拼贴出一个村庄完整的往昔和迎面而来的变化”^①,小说延续并超越了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及“挽歌”式叙事,肯定了现代商业文明之于乡村的积极意义,并在思索我们今天如何重新发现乡村,又何以安放传统,呈现乡村过去与当下的过程中,通过消费社会中乡村伦理秩序的变化,质询现代性的诸种后果,为探察中国主体性的乡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照。

马金莲以文学的方式深情凝望乡村,赓续中国抒情传统,使她在撷取、检视乡村日常生活图景乃至现代变迁史时,总是有意无意地进行情感过滤和提纯,为其笔下的村庄铺上宁静、温暖、美丽的面纱。她坚信“在这苦难的人世间,小说是可以慰藉心灵的一束火光,尽管它总是很微弱,但是只要坚持燃烧,发出光芒,我们的内心就拥有希望,在坚硬的生活表面下,包裹着一点幸福”^②。《亲爱的人们》借由主人公马一山之口道出:“所有的生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世上留下印。羊圈门这一两百来口人,在外面世界的人看来,可能就可怜得很,蜷在这深山沟沟里,一辈子没有啥大的指望,只能说是活着,一辈一辈把根脉往下延续。但在羊圈门人自己看来,每个人都有值得活的事情,都用心用力地活着,活得滋味绵长,不比外面世界的那些人差到哪儿去。”^③余华在《活着》中以福贵的生命浮沉,揭示为活着而活着的人生本相。《亲爱的人们》中,马金莲以饱含深情的笔调,指出世间万物皆有其存在的意义,即使“低处”的生活仍有其活法和指望,同样可以过得滋味绵长。这种对坚硬的生活表层下希望与美的诗意渲染,虽一定程度上会简化甚或遮蔽历史变迁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但也会发出慰藉心灵的光束,烛照时代、历史褶皱中的凡俗人生,让人们看到“低处”的活法和指望。

(刘志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责任编辑:叶昕昀】

① 申霞艳、杨穗婷:《乡村·童年·岁月——马金莲论》,《文艺评论》2017年第12期。

② 马金莲:《涂抹小说的缘由——短篇小说集〈父亲的雪〉后记》,《六盘山》2012年第6期。

③ 马金莲:《亲爱的人们》(上),第441—442页。